

歌德的“中法”四季晨昏杂咏

(法)热内薇·艾帕妮 著
张茜茹 译

“诗人歌德晚年时读了雷慕沙（Abel-Rémusat）平庸的法译中国小说，受到启发，并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兴趣，在爱克尔曼（Eckermann）与歌德的谈话记录里，1827年1月31日这一天，他写下了这样的内容。”

这段话出自1927年出版的《好逑传》德译本后记，其书名为 *Eischerz und Edeljaspis*，由弗兰兹·库恩（Franz Kuhn）翻译，此时距对话发生之时已有百年，而这段陈述却有些令人不快。一方面，它误以为爱克尔曼所说的就是《好逑传》这本小说¹，另一方面，对于雷慕沙这样一位率先译介中国小说的法国学者所做的辛苦工作，它没有给出公正中肯的评价。但它仍让我们注意到了法国、中国、德国三者如歌德创作中的共同作用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。

研究者们已经从歌德异常丰富的创作中理出了中国这条线索。这里还要在这次中德对话中加上法国，亦即将它置于一个跨国界的欧洲语境中研究，置于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这个时代背景下研究。实际上，正是在这个时期，法德语境中产生了“世界文学”（Weltliteratur）的概念。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尤其应该引起关注，他为自己于1826年出版的《玉娇梨》法译本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，其中可以见到这些见解，而《玉娇梨》则是歌德在1827年所读的两本中国小说之一。我们的视线最后将聚焦在歌德的抒情组诗《中德四季晨昏杂咏》（*Chinesisch-Deutsche Jahres- und Tageszeiten*）上，这组诗共有14首短诗，其中大部分创作于1827年5月。然而，为了更好地感受这次中德对话，首先应当回溯到线索的另一端，也就是18世纪60、70年代，彼时，歌德的文学事业方才起步，而这条线索则刚刚织起。从中可以看到，从那时起，法国文化已经开始影响日后中德对话的形成。

歌德眼中18世纪的欧洲：对中国痴迷的欧洲

18世纪欧洲学者们关于中国的乌托邦式政治思想并未引起歌德的注意。他总是对于具体的问题产生兴趣。然而，18世纪的欧洲对于中国表现出的特殊偏爱却让歌德不满。

在自传里，歌德叙述了他求学期间所患的一场疾病，他因此在法兰克福的家中休养了两年，直到1770年4月才得以重赴斯特拉斯堡。此后不久，他与父亲的关系就恶化了，日后回忆起来，歌德觉得此乃他与父亲两代人的矛盾所致即我们今天说的代际冲突：父亲一边是不理解，孩子一边则是年少轻狂夹杂着理想主义。在莱比锡，歌德的绘画老师是奥塞尔（Adam Friedrich Oeser），他也是温克尔曼（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）的好友，经由老师奥塞尔的教导，

¹ 君特·德本（Dünter Debon）两次为我们指出了这个错误：《好逑传》先是被译成了英语（1761年），紧接着，在1766年便被译成了法语和德语，法文版译为艾杜（Marc-Antoine Eidous），德文版为冯·穆尔（Christoph Gottlieb v. Murr），很有可能早在1796年，甚至是1781年，歌德就已读过这本小说了。此外，1815年9、10月，歌德赴海德堡，也在朋友圈中传阅了《好逑传》，当时他已经开始着手翻译波斯诗人哈菲兹（Hafis）的作品。（君特·德本，《歌德在海德堡讲解一部中国小说》，君特·德本及兹亚（A. Hsia）合著，见于《歌德与中国-中国与歌德》，伯尔尼/法兰克福/纽约，Peter Lang出版社，1985，52-62页）